


新的政经周期 中国的变与革

大变革

乔建新◎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新的政经周期 中国的变与革

大变革

乔建新◎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变革 / 乔建新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060-9876-2

I. ①大… II. ①乔… III. ①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8919 号

大变革

(DA BIANGE)

作 者: 乔建新

策 划: 姚 恋

责任编辑: 辛岐波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876-2

定 价: 4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4086980-823

前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道德经》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老子的思想既质朴，又深奥，被称为哲学中的哲学。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一般的道理上讲，很多中国人当然懂得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可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老子同样给出了解释：“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就是说，世间的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但是在人性和观念的制约下，人们要想超越自我，按客观规律做事，却并不容易。应当看到的是，这无论对于一个人、一个党或者一个民族来说其实都一样。

一、改革再次站在历史的转折点

当前，欧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联合体和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但是，人们是否想过，这一现象是否与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该地区有联系呢？很明显，结论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欧洲人而言，和平与融合正是经历了长期相互仇杀与利益争夺之后的一种结果。

岁月沧桑，时光流转。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创造了连续38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正在从继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后期的日本和韩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的“世界工厂”向世界的超级消费大国转换。

在经济领域，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进入和输出国，汽车销售量首次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2016年，GDP74.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住了较快的增长。2016年8月，人民币首次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升至2.79%，前三位的美元、欧元、英镑所占份额分别为44.8%、27.2%和8.5%；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

在科技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完成了神舟七、八、九、十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并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还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和创新成果，其

中包括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超强超短激光器、超级计算机、离子电推进技术、第四代核电、高速铁路建设、C919大型客机、长征五号大推力火箭等。

在社会福利领域，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改善民生、分享成果为主线的社会改革和建设，迅速成为中国的主体性改革。近十几年来，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得到了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从国有企业扩大到了各类用人单位，从城镇到农村，从单位到城乡居民。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涉及13亿人，被称为“世界性难题”的社会保障网络。201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比上年减少1232万人。同年6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政府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根据《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2016年，中国超过1000万人告别贫困。并且，未来五年，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著名记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此人以撰写世界各大洲社会政治的“内幕书”而著名，其一举成名的开山之作是《欧洲内幕》。此书出版25年后，在其续篇《今日欧洲内幕》中，他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表德国的是希特勒，代表法国的是一大帮人，而现在相反。因为1961年的德国，虽然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个有力人物，但是国家已经分裂，在西部、东部有好多举足轻重的德国人，而法国只有戴高乐。此后，约翰·根室还连续写了《非洲内幕》《亚洲内幕》《拉丁美洲内幕》《南美内幕》《美国内幕》和《今日俄国内幕》等著作。

这里引述《今日欧洲内幕》的目的在于说明，约翰·根室所揭示的现象有两个含义：其一，对于民族的前途而言，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也正是一次新的历史性转机即将出现的时候；其二，在权力的过分集中之后，其后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从长期看，两者都是一种带有

必然性的规律。因为，权威不可能被持久地传承，能保持政权稳定的基础只能是制度。

二、改革必须面对的三个传统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中国的现实是面对三个不同的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明、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的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一贯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从中国所经历的政治历程来看，中国人的政治理念必然会既留有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子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又不可能不受到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如果看不清这一点，仍旧抱定“左”的思维方式，只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那恰恰是，不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唯心主义。

首先，有关儒家的思想传统。应当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的思想虽然使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繁荣昌盛，但同时也束缚了中国人理性观念和创造性的发挥，并且阻碍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因此，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

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并在近代以后逐渐转入衰落的原因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谈到了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弊病——没有思想自由，缺乏思维自主性。作为《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的作者，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宗教伦理的类型分析出发，认为中国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受限于这种强势的“传统主义”。

当谈到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时，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发表了看法，他在《2000年大趋势》中说：

“试看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代就是没有意识形态框框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发明最多。及至明清，仅容儒家一家之言，中国人的创造力便消失了。”而马克思（Karl Marx）则指出，古代中国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没有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没有确立私有制原则的法权思想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很显然，与上述其他观点比较，马克思的观点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

简而言之，大师们看问题的角度虽不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即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儒家思想的确起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并且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存在缺陷。联系现实，其含义是，封建社会留给中国人的，不单是儒家的道德观，其中也必然含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一言堂”“官本位”等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做“父母官”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存在于部分官员的意识之中。

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的三民主义，与其说这在中国是一种传统，不如说是一个过程或者一种尝试。1905年，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曾提出了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核心。他的民权思想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他说道：“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方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在其民权思想的六个方面中，孙中山将“民治”进一步细分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四项具体权利。

1906年，针对西方“三权分立”存在的弊病，孙中山又以“五权宪法”，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来完善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革命实践方面，孙中山领导和发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并制定了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宪法的《临时约法》。虽然，由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并没有取得胜利，然而其影响却绝不能被忽略。

关于西方由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节点，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的作品《神曲》作为划分那个时代的标记。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雏形，起源于公元前510年至前27年，取消了王室、建立了奴隶主体制的古罗马共和国。此后，这种政治体制成为了普遍被欧洲和世界仿效的模板。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将意大利称为西方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的根据。

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的，是开放的和跨国度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多党制、普选制、议会制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西方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观念、体制和模式并不都具有普适性。由于世界各国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结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均不相同，所以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作为统一的民主模式是不现实的，这个世界绝不会如此简单。不过，也应当看到，西式民主毕竟是一面镜子，不能被全盘否定。

另外，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传统和信仰。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党、政、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军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二是照搬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政治体制基本适应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需要，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然而，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这种体制便明显地暴露出了问题。其结果是，延续思想上“左”的倾向，最终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追溯其演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是公元前古希腊“柏拉图共产主义”、16世纪英国和意大利的乌托邦思想，以及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延续。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完全是根植于西方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它并没有在西方获得成功。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最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发现了剩余价值和剥削。1859年，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他又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经济生活入手，研究整个人类的结构、矛盾、机制、规律、发生和发展。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和发展的研究，他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理论，并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恩格斯的评价是，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世纪之交，在西方，马克思先后被英法等国最有影响的媒体评为“千年思想家”。此后，2005年，马克思又因创建唯物辩证法哲学以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而被誉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是社会根本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发展规律和前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说：一般的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而他本人和马克思感兴趣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发展趋势。

同任何宗教一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信仰，是政治信仰。

毋庸置疑，对于国家或民族而言，最具有凝聚力的就是信仰、观念、文化和传统。这其中，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与社会观念、文化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无论是政治信仰，抑或是宗教信仰，其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一种社会观念的提高和升华，或者说是追求和寄托；不同之处在于，政治信仰是某个政党或者某个社会精英群体的奋斗目标，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宗教信仰则是大众的一种社会观念，属于文化传统的范畴。简单来说，政治信仰体现的是党派或少数社会精英群体的凝聚力，而文化传统连同宗教信仰体现的则是整个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

如果从现实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做进一步的分析比较，应当可以看到，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实一样，西方文明同样也是一种现实，并且，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来自于东方，它本来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便将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崇高的信念和理想，它也不可能通过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实现。人们需要做的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绝不能被一种乌托邦式的思维方式所驱使。道理其实很简单，伴随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融合将会越来越多，中国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坚持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中，恩格斯明确表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在第三十九卷中，他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 在论及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学的终结》中指出：“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①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实是，除去利益冲突、战争冲突、文化冲突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信仰的危机，信仰危机的出现与现代社会的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越发达，信仰的危机就会越加严重，因为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或是超现实的理想。由此，不禁使人们联想起1847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Proudhon Pierre Joseph）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事。文中，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蒲鲁东基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并指出蒲鲁东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②

由此看来，时代的发展已经证明，面对中华民族三种不同的传统，过分地强调或者排斥其中的哪一种都是片面的，相反，有选择地将三者有机地融合，才可能更具有发展优势。人类最终希望实现的是安全、和平、自由、平等、民主和富裕，最终希望看到的是文明的融合与世界的大同。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失去发展动力的文明必然衰落，甚至走向消亡。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西方

①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② [德]马克思（K.marx）：《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页。

的认知和学习，经历了从机械电器、自然科学、经济管理、政治体制，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的过程。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后，再反观这一历程，不难发现，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而言，其文化、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才是一个民族的根本。

历史的经验证明：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有坐千秋江山的美梦，夺取统治地位之后，都将江山永固的幻想寄托于君王的贤明之上。然而，历史的规律却总是，短周期的王朝只有几十年，长周期的王朝也就一二百年，多的不过三百年。所以，必须认清的是，社会必然要变革！“坐天下”的永远无法沿袭“打天下”的一切。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和理论创新，单纯地依赖于某种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其后果总是难以为继。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①

进一步说，历史规律所体现出的并非都是些与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相关的大道理，其中也有常识性的小道理。在中国，这种小道理就叫“富贵不过三代”。因此，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的外交战略，还是人民的江山，既会受到那些大道理的影响，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小道理的制约。头脑中只有大道理没有小道理的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是乌托邦；只有小道理没有大道理的是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是世俗。因此，面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普遍价值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如果只是采用简单的理想化的方式来对待，其效果不可能好，并且也不可能被全体国民所认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67—468 页。

三、改革之本：告别主观唯心主义

在当代的中国，人们以“70后”“80后”“90后”等字眼，来描述现代社会不同年龄段的青年人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追求上的差异。并且，很显然，未来的中国必定将会由他们来继承，这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此，也有人将其称为“人口的代际更替”。所以，很难想象，对于这些每天上互联网、经常吃麦当劳、看好莱坞大片、追求世界名牌、办西式婚礼、过情人节和基督教圣诞节的青年人而言，有什么力量能阻断他们接受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呢？历史上，原本不属于中国的佛教、基督教都已经进入了中国，难道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能被完全地阻隔在中国的国门之外吗？

2013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报告。报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80后”的青年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报告显示：中国“80后”的总人数为2.2亿人。目前，这批被称为“网络上的原住民”的“80后”，在旧的价值体系逐渐消解、新的价值系统尚未确立的转型过程中，既对国家的前途怀有信心，又对社会及自身的现状抱有诸多不满；这些人一方面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社会力量的左右。在社会观念上，中国“80后”的青年人已经呈现出带有草根化、平民化、娱乐化且不乏叛逆精神和批判倾向的特征。

1980年，在谈到行政体制改革时，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

难办。”^①他还说过：“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②

那么，如何才能对于邓小平讲话中的问题实施更为及时和有效的预防和惩治呢？很显然，不能只在事发之后，依赖专职的纪检委或反贪局来行使职能，还必须让大众和媒体也共同参与监督。事实证明，权利与道德不能画等号。道理很简单，在个人、民族、国家和政党的权利与利益中，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是构成民族和国家的权利与利益的基础，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有当家作主、自由选择自身命运的权利。一个领袖、一个执政党无论多么英明，在执政党的利益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等号，任何政党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因此，从理论上说，政治领域也应当一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照搬西式民主的模式；相反，结合中国的现实，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应当更稳妥，更适合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和56个民族的大国的国情。

此外，政治竞争同样具有多种形式。除多党制外，开展党内竞争演说、普选、自由辩论，以及在执政党、媒体、大众之间真正建立起相互制约的关系，容许媒体、大众积极参政、议政等也是一种竞争。简单来说，竞争本身就体现了民主。

体制改革有“治表”与“治本”之说。实际上，腐败、权贵、分配不公、国进民退、环境污染、社会群体事件等，这些还都只是“标”。而说到“本”，在中国，大概有相当多的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所谓“本”就应当是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建立国家体制，即以实行多党制、普选制、议会制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作为最终的改革方向。不过，其中的问题是，西方政治体制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虽然，西方的文明代表了一种现实，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结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均不相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观念、体制和模式既不具有普适性，更不能拿来生搬硬套。

抽象到价值观的层面，西方的民主所体现的自然是西方的文明，包括西方的社会人文和政治人文思想，即人权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民主政治和强权政治的价值观体系。概括起来，这个价值观体系就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强权与利益”。在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中，“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是对内的，而且并不真实，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就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而言，事实上，其国家机器最终和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便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而西方的“强权与利益”则是对外的，维护的仅是西方自身的国家利益。因此，最终“利益”才是西方价值观体系的核心。

在哲学界，唯心主义既被划分成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类型，又被指出其产生有社会历史、阶级和认识论三个根源。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的意识是第一性的，客观唯心主义强调在人之外，客观世界还存在一个超自然力的意识，比如上帝和神。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被归结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所致。阶级根源是指在阶级社会，各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往往是统治阶级用以麻痹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认识论根源是指将人认识过程中的某一特征片面地加以夸大，使之绝对化，造成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分离。如列宁所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①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2页。

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如果再套用上述唯心主义产生的三个根源之说，显然已不够全面。不过，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也并非不可对照。具体来说，在当今社会，执政党中一部分人的官僚主义严重，其实就是传统政治中“官本位”意识的继续；既得利益者以权谋私，就是对全民的一种剥削；一些高层领导者主观唯心、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就是阅历简单和知识结构单一的直接体现。这些人可能知道孔子和马克思等人说了些什么，但却对老子的思想没有深入的了解，更不知道汤因比、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罗素（William Russell）、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等人都说了些什么；只知道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却对于西方政治文化并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认真研究过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一些与体制改革有关的社会科学。

唯心主义当然也能在文风中反映出来。在理论界和某些领导人中，由于抱定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些人的思想僵化、知识匮乏、视野狭窄。说观点，一开口便是官话、大话、空话、套话；写文章，就像痴人说梦一样地充满纯理论的说教，从概念到概念，从教条到教条。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似乎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人类文明的孤岛，马克思主义就是金科玉律，是一种能够涵盖一切的终极理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精神境界，而将所有希望改革的声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倾向。总之，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主观唯心主义始终是深化改革最根本的障碍。

由此可见，在执政党内存在的唯心主义，绝不是个学术问题，更不只是文风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问题。一个执政党，如果其政治理念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革命性变化，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彻底的改革不可能出现，并且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将遭遇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巨大风险。

因此，一方面，中国的体制改革，应当以思想改革为先导，正本清源，